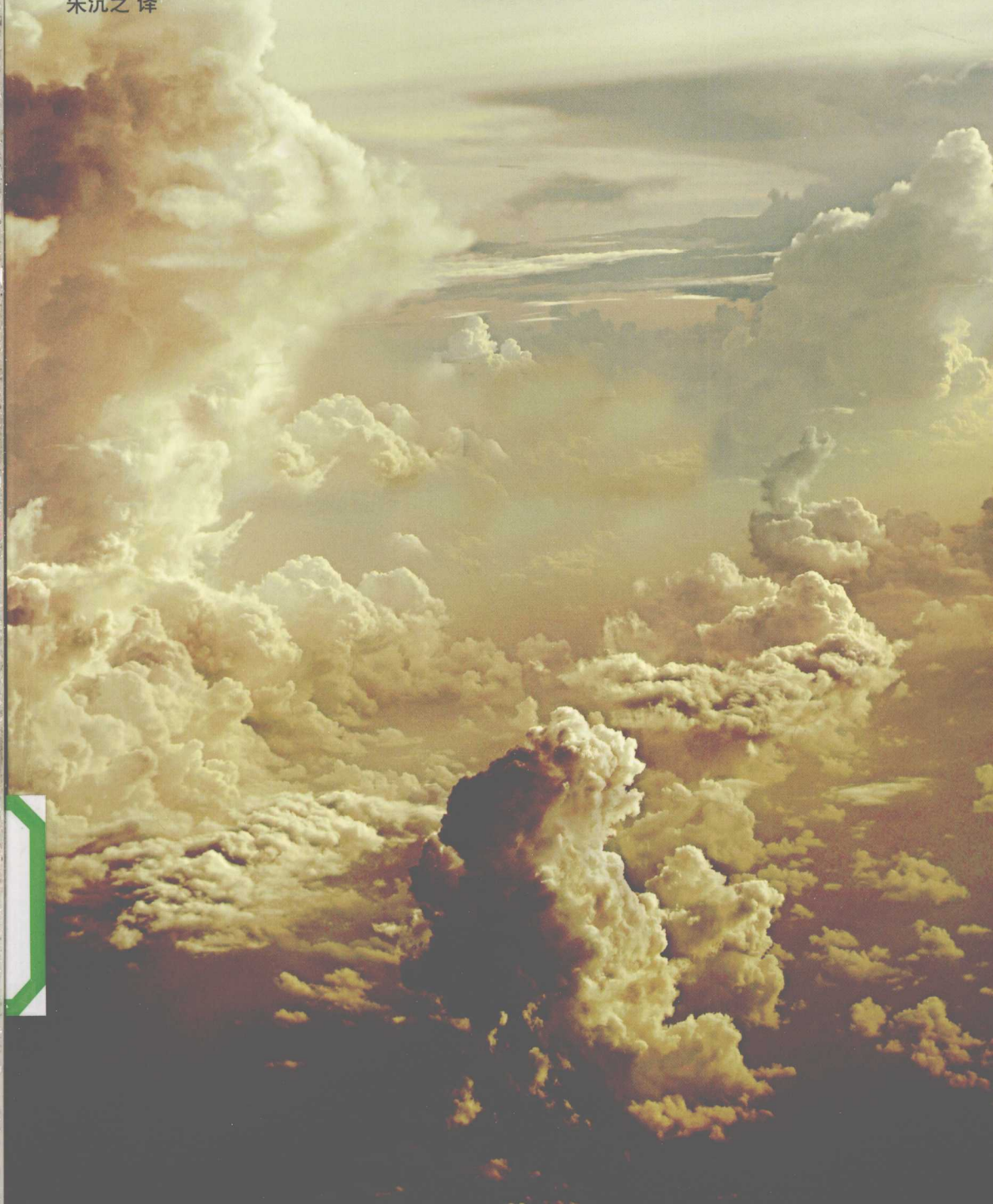


THE
FUTURIST
THE LIFE AND FILMS
OF JAMES CAMERON

[美] 丽贝卡·基根 著 Rebecca Keegan
朱沉之 译

天神下凡

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人生



天神下凡

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人生

THE
FUTURIST

[美] 丽贝卡·基根 著
Rebecca Keegan

朱沉之 译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神下凡: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人生 / (美)基根著;朱沉之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4

书名原文:The Futurist:The Life and Films of James Cameron

ISBN 978 - 7 - 5118 - 0582 - 9

I. ①天… II. ①基…②朱… III. ①卡梅隆,
J. —传记 IV. ①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527 号

天神下凡:

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人生

[美]丽贝卡·基根 著

朱沉之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社

策划编辑 赵利铭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数 170 千

版本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0582 - 9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导言:未来主义者	1
1. 一个男孩和他的脑	5
2. 罗杰·科尔曼电影学校	18
3. 破门而入	32
4. 这一次是战争	51
5. 向《深渊》凝视	69
6. 然后就是 2	91
7. 神话与《谎言》	111
8. 不沉之船	135
9. 现代麦哲伦	168
10. 880 计划	187
后记	208

导 言

未来主义者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得完蛋。”说话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导演。2000年的地球日,他在加州圣塔芭芭拉讲演,就是拿这句话来自嘲,指的是他对突然而至的炼狱场面的嗜好。詹姆斯·卡梅隆一直以来都在谨慎而期待地前瞻,而在电影这个他所投身的艺术形式中,他则以科技含量和艺术追求为人之先。他不断地鼓动我们这些旁人,和他一起探寻危机四伏的未来世界。

在1984年的《终结者》(*The Terminator*)中,卡梅隆将地球的命运交在一位小餐厅的女服务员手里。自此之后,他一直坚信完全可以让普通人来承担非凡的职责。他告诉昏暗的电影院里观看影片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尤值一提的是)女人:将我们从机器人手里拯救出来,可能就得靠你;“泰坦尼克号”上抉择生死的,也可能就是你。

不过,卡梅隆自己的故事却绝不普通。他是一名卡车司机,却在四十岁之前导演了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随即便抛弃好莱坞,花了十年工夫探索海洋的深处和科学的巅峰。他能动手,敢梦想。他创新推出的电影工具彻底变革了故事叙述的方式;他率先运用的科技手段,如同声音和颜色一样,为今日的一代电影人所深切依赖。他小时候聪明过人,成年之后的多数时光都在做别人所谓不可能的事,诸如在海底两

英里半的深处拍摄电影,或者将一个女性塑造成动作英雄。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将电影推入了数字时代,使电影摄制者得以解放出来,能够自由讲述过去只有在想象中才行得通的故事。是他首先证明电脑不仅可以制作出清晰的影像,更能创造出视觉上栩栩如生的形态:在《深渊》(*The Abyss*)中,他以电脑制作的二十个镜头展现了一条由水构成的触手。在《终结者2》(*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中,他创造了一个CG(电脑制图)角色——由液态金属构成的T-1000,以此延伸了物理的定律,扩展了叙事的限制。在《泰坦尼克号》(*Titanic*)中,他所应用的特技并不张扬,却逼真地再现了一艘巨轮的沉没,扣人心弦,给人留下的感受交织着华美、恐惧和失落。

而真正引发了革命的,还是《阿凡达》(*Avatar*)这部超乎卡梅隆之前任何一部电影的大作。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将他打算运用的技术陈述于那篇《数字宣言》中,并且在随后的十五年时间里辛劳耕耘,将其逐一完善。他研制的摄像机使他得以窥入虚拟世界,并推动整个电影工业采用了数字3D格式。以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导演好像冲破了银幕,抓住观众的手,将他们牵入潘多拉这个无人见过的奇异世界。这颗星球上有漂浮的山、发光的雨林,以及一群优雅、高大、蓝色的纳威人(Na'vi)。

当然,卡梅隆的幻想工具,也仅仅是工具,是《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猩猩手里那根骨头在今日社会的最新版本。科技并不见得有驾驭科技的智慧相伴,不论在艺术创作还是在军事行动中都是如此。我们的科学不断进步,而其阴暗面则是卡梅隆在他每一部电影中都有所涉及的一个主题,并让他个人深感困扰。通过《终结者》一片,他首次在电影中提出“末日即将到来”的警告。在这部电影中,人类不经意地将我们的核密码交给了机器,还让机器有了人性,导致其在2029年向我们发动战争。二十五年之后,他用《阿凡达》告诉我们,人类将自己的坏习惯——对地球的贪婪掠夺——拓展到了星际空间。

在片场上,要跟上卡梅隆,必须脚步如飞。他走路的速度超乎常人。头一回去《阿凡达》在洛杉矶的摄影棚探班之后,我明白,以后工作要穿运动鞋。那一次采访,是《时代》周刊委派的任务,我对所见的一切都深

感震惊——电影制作的方法被重新创造,虚拟的布景只存在于导演的摄像机和他的脑海中。我知道卡梅隆是一位创新者,而这部影片显然是他作为一位思想前卫的电影摄制者的惊夭之作。我观察着导演的工作,很好奇一个人如何只对困难的事情有兴趣,而且只想把它做得完美。我决心以更近的距离,追踪这部引人入胜的影片及其制作过程。

在这部电影的“表演捕捉”拍摄过程中,以及卡梅隆跟位于新西兰惠灵顿的特效公司“威塔数码”(Weta Digital)的创意人士进行视频会议,力求完善《阿凡达》的两千五百个特效镜头时,我在旁边如墙上的苍蝇,保持静默。在他与科学家开会商讨,完善《阿凡达》神话的理论基础时,我造访了他的制作公司“光风暴”(Lightstorm Entertainment)。在他对电影进行剪辑时,我去了他在加州马利布的家。我曾和卡梅隆的五十多位朋友、家人和同事谈话。我见过他母亲,这位其貌不扬的加拿大老奶奶,有着一颗动作女英雄的心。我专访了他的朋友阿诺德·施瓦辛格,后者在卡梅隆的三部电影里饰演过大反派或者真英雄,还常常周末同他一道在圣塔莫妮卡的山上骑摩托车。我和丹尼斯·穆伦谈过,他曾参与《深渊》和《终结者2》中效果惊人的CG设计。我拜会了彼得·杰克逊,他站在卡梅隆的肩膀上,拍摄了《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三部曲,之后又将自己的特效工作室借给卡梅隆拍摄《阿凡达》。我采访的人还包括:卡梅隆第二任妻子盖尔·安妮·赫德,她也是他的第一位制片人搭档;彼得·彻宁,这位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高层为《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两个项目开了绿灯;乔恩·兰多,这位制片人帮助卡梅隆实现了他宏伟的计划;蕾·桑奇妮,她负责运营卡梅隆的公司。

“你和吉姆(Jim)*在一起,难免觉得自己有点蠢。”在我探访工作的一开始,杰克逊就这么警告过我。“他的头脑实在是灵,叫人畏惧。”杰克逊此言不假。卡梅隆的大脑惊人地强大,极富魅力,且左右两边发展均衡——他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我所见识到的这个人既有能力理清神秘的工程问题,如未来的直升机怎样降落才更为现实;又能清楚地向一群艺术家说明一个明确的审美目标,如一个葱郁的外星森林在夜里

* 詹姆斯(James)之昵称。——译注

如何幽幽发光。他的另一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协调一大群唱反调的人,还能同样惊人地说服大批理性思维的人,和他一道追求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目标。

卡梅隆的口头禅之一是“我就知道会这样!”当一个特技出现问题,或者某个技术手段失败的时候,他总是不耐烦地这么说。而当某位一流的演员演得很好,或者一个疯狂的技术手段成功的时候,他也会如释重负地这么说。他多部描绘未来的电影,都被证明比普通的科幻片预见得更准确。影片中所包含的某些想法和形象——机器人式的兵器、士兵的外骨骼装备、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经济崩溃、摄像机推动的文化——都在日后得以成真。同样变为现实的还有许多他宣扬的电影制作技术,虽然他的同行曾一度表示怀疑。当他在2000年开始研制数字3D摄像机时,业内多数人仍认为,3D仅仅是一阵娱乐之风,最好任由它同“味觉电影”(Smell-O-Vision)*以及迪斯科一样,最终为历史所淘汰。然而,2010年,迪斯尼和梦工厂出品的所有动画电影和若干部真人电影都将以数字3D格式制作。考虑到卡梅隆一贯是虚拟世界中的预言家,完全有可能到2029年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具备最佳的生存技能才行。

但是,一切关于未来的虚构故事,包括卡梅隆的作品在内,不仅是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更是捕捉了我们现时的期望和恐惧。卡梅隆的电影提供了一个空间,让我们想象如何才能通向更好的将来。是的,我们全得完蛋,卡梅隆对圣塔芭芭拉的听众如是说。“但是,从正面角度看,这个即将来临的末日,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大脑,运用自己的科技亲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绝对可以消除弊害,避免其发生。”卡梅隆的事业建立在对通俗智识的怀疑之上,并且相信个体的力量。在他的展望之中,我们能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里面蕴含的深意,已远远不止于拍摄好看的电影来娱乐大众。这决定了我们即将面临的未来。

* 1960年在美国推出,是在影院座位下准备各种气味,使观众能闻到影片故事场景中的味道。——译注

1.

一个男孩和他的脑

终结的开始

世界末日就要来了,而他才八岁。那一天,家住安大略省奇帕瓦(Chippawa)的詹姆斯·卡梅隆,在客厅茶几上找到了一份传单,上面详细介绍了如何建造一座核爆炸之后防放射尘污染的民用避难所。奇帕瓦地处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境内那一段附近,是一个古怪而不乏情趣的小村落。那是1962年,正值古巴导弹危机。菲利普·卡梅隆和雪莉·卡梅隆觉得,他们有理由提防原子弹——他们的住所离大瀑布不足两英里,而瀑布是国境两边的城镇重要的电能来源。然而,对他们的大儿子来说,发现这份传单,是改变一生命运的重大时刻。在此之前,唯一让这个男孩挂心的就是要在街灯点亮之前骑自行车回家,这是家里的规矩。卡梅隆说:“我意识到,我原以为这个世界安全无忧、美妙宜人,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我们所知的世界随时可能终结。”从那时起,他就着迷于核战争这一主题。他夜里在被子下面打着手电看科幻小说,书中描绘的炼狱般的场面进一步助长了他的恐惧。学校的孩子里,可能只有他觉得在核攻击应急演练中躲到桌子下面既不好笑又不愚蠢。“这是疯狂的臆想,还是出于对潜藏真相的警觉?”今天的卡梅隆依旧心怀疑虑,

“从现状来看,这确实显得有一点杞人忧天,但是,要自我摧毁,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这个忧心忡忡的八岁男孩长大之后,将会讲述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生动故事,从2029年机器人发动的战争,到1912年一艘被认为不会沉没的巨轮沉入海底。詹姆斯·卡梅隆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基于他童年时代的恐惧而提出的警告,也是如何在大灾难中幸存并维持人性和精神完整的指南。他自己的故事,开始于家族里一代又一代不安分的先人。

菲利普和雪莉

卡梅伦的曾曾曾祖父是一名教师,于1825年从苏格兰的巴惠德(Balquhider)移民到加拿大。“他算得上是个爱自由、会思考的人,他不喜欢国王,”说话直率而又颇具分寸的电气工程师菲利普如此解释。卡梅隆家族是苏格兰最古老的宗族之一,以凶悍的剑士而闻名,参与领导了詹姆斯党叛乱。这场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血腥的宗教战争发生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他们中间有的人以叛国罪名遭处决,有的人被流放。菲利普·卡梅隆这一支最终来到了安大略省的奥兰治威尔,位于多伦多西北大约五十英里外。在那里,他先是进了一所只有一间屋子的学校,继而到北方的镍矿做矿工,攒了钱之后,在1948年进入多伦多大学。“爸爸很有男子汉气概,很健壮。他似乎总是比别人强,虽然其实并非如此,”菲利普夫妇的小儿子约翰·大卫说,“你一见到他,就知道不能惹他。别人要拿板手扳两回的事情,他半圈就搞定了。”

菲利普在上高中时认识了雪莉·劳。她身材苗条,金发碧眼,精力充沛,在奥兰治威尔的女子赛马会上开过运牲口的大车。她创作过鼓励国民购买战时债券的宣传画,荣获全县大奖。画中描绘了烈焰吞噬城市的惨况,还以醒目的红色字迹发问:“你想让这种事情发生吗?”在三个孩子都还不到八岁的时候,身为母亲的她参加了加拿大女子陆军,周末高高兴兴地去集结,穿着工作服和战斗靴,学习蒙眼装配步枪,或者在大雨中苦练队列。她没有放弃油画和水彩,而且每周还花一个晚上参加一门成人教育的兴趣课程,如地质学或天文学。“我做这些事情全是为了

自己,不为别人,”雪莉如是说。她坦言绝不曾想到自己会是《终结者》和《异形2》(*Aliens*)这些电影中强悍女性形象的灵感来源。“我不明白吉姆为什么觉得我那么自立,”雪莉耸耸肩膀,碧蓝的眼眸炯炯有神。在他们位于加州卡拉巴萨斯的家里,餐桌边的菲利普抬起眼,显然被结婚五十七年的妻子逗乐了。“呃,你确实很自立,”他板着脸说。雪莉很有创造力,冲劲足,脾气暴。而菲利普则坚忍克己,善于分析,一丝不苟。他承认:“对于愚蠢的人,你很难同他们周旋。”两人迥然不同的个性,独特地结合在他们的大儿子身上,这个孩子既有精明的头脑,又是浪漫的艺术家。

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时,菲利普夫妇住在卡普斯卡辛的一间小公寓里。那里又冷又偏,是安大略省北面伴随当地工厂而建立的一个小镇,菲利普就在此处一家造纸厂做工程师。雪莉原先在多伦多受过护士训练,但那个时候她只能忙于家务。1954年8月16日,詹姆斯·卡梅隆迟了一个月才出世。他初出娘胎时大声啼哭,这幅景象,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应该不难想见。因为他是第一个孩子,菲利普夫妇并不知道他们的吉姆有何与众不同。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卡梅隆踱进一位医生的办公室,伸出手说:“你好吗,医生?”菲利普夫妇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有些发展超常。

奇帕瓦

卡梅隆五岁时,菲利普因为工作需要,举家搬迁到尼亚加拉瀑布城,之后又搬到奇帕瓦一处更舒服的错层式住宅,在那里一直住到1971年。家中人丁日见兴旺,后来又有了迈克、瓦莱丽、泰丽和约翰·大卫。菲利普家的孩子在奇帕瓦溪的岸边恣意玩耍,实际上,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条“溪”算得上是湍急的河流了。他们经常钓鱼,甚至还冒失地游逛到深谷上方。有一次,卡梅隆踩到一块长满藻类的薄板,失足滑倒,滚向深达百尺的悬崖。幸好最终抓住了一棵树的枝条,才攀爬回来。这场遭遇,他从未告诉父母。他说:“远足时发生的事情,一概不外泄。”他开始东修西补,造东西,做实验,通常都是和弟弟迈克一起。他们造出卡丁

车、筏子、树屋。他最喜欢的玩具是可以制造模型的套件，那是他拿卖贺卡的钱换来的（雪莉出钱给邻居，请他们买他的贺卡——妈妈们也会保守秘密的）。他拿这个套件造出可以分发糖果或者可乐瓶的鲁布·哥德堡式的装置*。有一回，他拿一个装蛋黄酱的瓶和一只漆桶组装成一个迷你潜水球，把瓶放在桶里，瓶内装了一只老鼠，然后从奇帕瓦溪的一座桥上把桶放到了溪底下。当他把桶提上来时，老鼠还活着，但想必受惊不轻。另一项让卡梅隆引以为豪的工程杰作，是一台“暑假投石机”。这台攻城的武器，是他在奥兰治威尔附近祖父母的农场里用一辆运草料的旧车改造出来的，可以发射二十磅重的石头。他将多余的木料拖到放牛的草场上充当靶子，拿他的投石机射着玩。

菲利普家里的男孩子善用工具，但并不光是做创造，也有搞破坏的时候。有一回，邻居家的孩子偷了他们的玩具，吉姆和迈克就进了头号嫌疑犯的树屋，锯断了用作支撑的侧枝。当小罪犯爬进去的时候，整个树屋翻倒在地上。“这回他们闯了祸，”雪莉点着头说，“有可能使旁人受伤的事是不允许做的。”菲利普在家里施行严格的管教，通常三两句话就能将利害摆明。“我爸爸曾经警告我，‘你要是闯祸，我就把你关到柴棚里去。’”约翰·大卫回忆，“我对家里的房子还是了解的，我有这个自信。家里其实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柴棚。这种威胁，比任何实际行动都不如。”

卡梅隆很早就有能耐动员一大批人为他的目的行事。大儿子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雪莉发现她那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和邻居家的伙伴带着零碎的木头和金属鱼贯而出，往家里的侧院跑去。“我说，‘你们要这些废料干什么？’”雪莉回忆，“吉姆说，‘我们要造一样东西。’”几个钟头之后，当雪莉去参观他们的大工程时，这批小孩造出了一架飞机。“你猜坐在飞机里被人拉着跑的还能有谁？”卡梅隆非常善于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事。家里人出去吃饭，他会主动约束弟妹。这个大儿子两手合

* 鲁布·哥德堡(Rube Goldberg)是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漫画家，喜欢在作品中设计出各种精密繁复的机械装置，以迂回的过程来完成其实非常容易的工作，他的名字因此成为化简为繁的代名词。——译注

覆,放在桌上,只有两个大拇指前后打转。这是在告诉比他年纪小的孩子,要跟他一样,别伸手去抓装盐和胡椒的瓶子。

雪莉注重培育儿子的艺术才能。在卡梅隆的要求下,有时候礼拜六他们会驱车八十英里去参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他会拿出画本,临摹博物馆里的盔甲和木乃伊。“我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马上就动笔画下来,”卡梅隆说,“作画是我将这些东西拥为己有的方式。”他照着喜欢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创造了自己的连环画版本。其中包括受1961年由雷·哈利豪森制作视觉特效的奇幻电影《神秘岛》(*Mysterious Island*)启发而创造出来的海盗,还有1966年《星际迷航》(*Star Trek*)第一季出现的宇宙飞船。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当地所有的设计竞赛——不论是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的西格拉姆塔上创作壁画,还是设计万圣节那天的银行橱窗。十四岁时,他给一家银行画了一幅耶稣降生图,换得一百块钱,足以让他为父母和弟妹买圣诞礼物。

菲利普夫妇的孩子们个个能冲善闯,好像都装了生理方面的涡轮增压器一样。吉姆和迈克年龄相近,脾气相仿,有时是同谋,有时是对手,通常两者兼具。迈克长大之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当了一名工程师,为大哥的《深渊》、《泰坦尼克号》和其他纪录片提供了精密的摄影和潜水技术方面的支持。两人都很聪明,对本人的意见都自信满满。他们这一对,严格来说,仿若威力巨大的炸药。他们可以把一场关于太空旅行的理论性对话变成一次混战。“他们两个搅和在一起,免不了要火光四溅,让人欢喜让人忧,”小弟约翰·大卫如是说。在他的比喻下,他们一家就好比“战前的日本,人人各行其是”。

菲利普一家每天六点吃晚饭,时间跟军队里一样严明。“我是制造炭的行家,”雪莉说,“我总是把东西烧焦。”儿子们对她的香辣肉酱和锅炖肉评价很高,但也都认为母亲最好不要把她的探险精神带入厨房。有些时候,晚饭桌上,他们一家就好像在比拼某种身体接触项目。“家里聚在一起的人越多,就越混乱,嘈杂一片,声音越来越大,只为了抢那该死的菜吃,”约翰·大卫说,“万一有人脱口而出不该说的话,那可有好戏看了。这一刻千金难买。总之你得积极参与其中,谁要在边上闲坐,准会被其他人生吞活剥。”

“吉姆，你不认字？”

童年的卡梅隆，有时显得太过聪明，由此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一年级快结束时，他的老师把雪莉叫来，说她儿子要留级一年。“她说，‘他不认字，他什么都不会做。他只是坐在那儿，往窗户外面看，’”雪莉回忆，“我说，‘吉姆，你不认字？’他一脸得意的坏笑。他知道我晓得他能认字。”雪莉叫儿子在老师桌上随意挑一本书。他选了一本科学方面的书，然后大声念出一段关于更新世时期物种的文字。“老师大为吃惊。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得字？’他说，‘难道你以为我愿意整天坐在这里读什么快看小狗跑*……’这孩子当时可把我气得够呛。”二年级上学期，雪莉又接到一通电话。这回是老师让她儿子跳级去上三年级。三年级才到一半，他又跳到四年级。雪莉规定，家里的小孩放学回来不许再做功课。她觉得他们花在书本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不过，卡梅隆书瘾大得很，贪看闲书，醉心于时下新鲜出炉的连环画，特别是《蜘蛛侠》(Spider-Man)。他也喜欢科幻小说，例如阿瑟·克拉克、罗伯特·海因莱因、雷·布拉德伯里以及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

卡梅隆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的斯坦福德高中上九年级时，学业方面所有的评奖都有他的一份。“我们觉得这实在是棒极了，”雪莉说，“但别的小孩不这么想。”他生得瘦，因为小学跳了两级，又比班里的同学矮一个头，生成了个活靶子。他说：“那时我可给揍惨了。”他避开体育，转而成了科学小组的负责人。他回忆：“组里只有我和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女生。”十年级时，他深深着迷于一门古代历史的课程。他说：“埃及、米诺斯、希腊、罗马。我现在还想得出每一节课，每一张幻灯片，几乎连课上讲的话都还记得起来。”那时候他已经学会怎么取得好分数，又不至于太过招摇。奖也就不再来了。卡梅隆身边不缺古灵精怪的朋友，所以不觉得受人排斥。但是，有时候，同龄人的集体思维让他迷惑不已。“他们觉得一起穿喇叭裤会显得太过离经叛道，”他说，“对此我无法

* “快看小狗跑！”(See Spot Run!)这句话出自美国一套以“迪克和简”(Dick and Jane)为主角的系列读物，这套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常用来教儿童认字和阅读。——译注

理解。”

在学校里,第一节课都得唱国歌,念主祷文。十年级的一天,卡梅隆站在第一排,耳畔是同学在唱歌念经,心里油然升起一股违抗的劲头,“我觉得这就好像部落里的吟唱。”祷文念到一半,他就坐下,翻开书读了起来。他抬起头时,老师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并没有对他施以惩戒。雪莉从小就带孩子上圣公会教堂做礼拜。而菲利普自十六岁起就信奉不可知论,所以总是待在家里。雪莉发现,儿子晚上躲在被子里看的书中有一本是关于世界各种宗教的大部头。主日学校的老师想让卡梅隆去上成人的圣经课程,雪莉拒绝了。十几岁的卡梅隆对宗教的兴趣,既是由于求知欲的驱动,又是精神追求使然。他成年之后拍的电影中充斥了宗教的形象。今天他自称是“换了信仰的不可知论者”——“我已彻底放弃不可知论,我现在称不可知论为胆小鬼的无神论,”卡梅隆说,“我的立场是,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会以某种精神上的方式持续存在,因此,需要暂且作出人无来世的结论,以之为行动准则。如果将来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还可随即修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卡梅隆对自己为何“不是”不可知论者的解释,同他父亲说自己为何“是”不可知论者的原因很相似。“不可知论者提出怀疑,”菲利普说,“他们不觉得一切都有答案。”显而易见,他们一家人都有着如此激荡活跃的大脑。

别的世界

卡梅隆成长的地方离最近的海洋也有百里之遥。他的脚趾头甚至从未触碰过咸水。然而,雅克·库斯托的水下纪录片深深地吸引了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位法国海洋学家的电影时常在电视上播出,将波涛之下丰富而神奇的生物世界通过影像传送给卡梅隆家这样的内陆地区家庭。多年以后,卡梅隆接受了库斯托感切于身的环境主义,但十六岁的时候,他满脑子只有探索的念头。“在我的思想里,深海开始等同于外太空,”卡梅隆回忆,“而这个异域却是我有可能达到的。”

卡梅隆受库斯托的影响,说好话求父母给他报名,参加在“布法罗基

“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池里办的潜水班。在青年会，他掌握了军事潜水法，知道怎样抗拒侵扰。教练在教学的时候会拉掉学员的面罩，把呼吸器从学员嘴里扯出。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卡梅隆机智随身，也让他建立了自信，并帮助他日后两度从几乎溺毙的险境中逃生，其中一次就是在拍摄《深渊》的时候。1971年，他第一次在青年会游泳池之外潜水，地点是奇帕瓦溪。按照要求，他潜水时得有同伴，但镇上就那两个专为消防局下尼亚加拉河捞尸体的人有潜水证。所以，他独自潜水，但腰里系了一根绳索，另一头由他父亲站在码头上牵着。卡梅隆说：“这真是傻得让人难以置信。不过，当时对我们来讲，这样做合情合理。”

卡梅隆和父亲的关系在青春期时开始紧张起来。菲利普希望他的儿子做工程师。卡梅隆说：“他对我了解不深，因为我喜欢艺术、科幻小说、奇思妙想之类的东西，而在他看来，这些都太不踏实了。我们之间隔阂很深。”如果说菲利普并不见得理解他的大儿子，但在儿子潜水的时候，他还是牵着那条绳：这既是事实，又是比喻。卡梅隆投身电影事业之初，一度食不果腹，菲利普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不论儿子选择的目标看起来如何难以实现，他总是默默地给予支持。卡梅隆执导的第七部电影《泰坦尼克号》成为当时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并赢得了十一项奥斯卡奖。在此之后，菲利普才开口承认导演这份营生还是有希望。

卡梅隆十几岁时的兴趣在于科学和艺术，但是，两者兼具的传统职业，显然难觅其踪。“当时似乎没有任何可能的折中之路。要么搞科学，要么玩艺术，但我对两者都有兴趣。”他的梦想是写一部科幻小说，并配上插画。卡梅隆说，如果绘图小说那个时候已经出现的话，正是他想做的事，但这一艺术形式当时还不存在。“我觉得，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我选择拍电影这条路，原因在于电影就是以图像来叙事。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1968年，当卡梅隆看完《2001：太空漫游》，从多伦多一家电影院里走出来时，首次考虑要将电影作为自己的事业。斯坦利·库布里克这部充满哲学意涵的科幻长片在票房表现上并不理想。那天，在设有一千五百个座位的影院里，十四岁的卡梅隆是为数寥寥的观众之一，独占楼座

第一排。这个宏大的寓言故事,从人类诞生之曙光初现,一直延伸到未来人类计划去木星旅行,其真实的特效和大胆的无对白表现形式,给卡梅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散场后,他踉跄着步入影院外面的光天白日中,在人行道边坐下便吐,因为影片第三幕的那一组足以致幻的镜头使他眩晕不已。他说:“我当时的感受一言难尽。这部片子在思想上非常令人兴奋,同时视觉效果非凡,让人迷醉。我觉得我喜欢的一切都在里头,尽管它没有告诉我任何答案。但是,我内心知道答案是什么。”从那一刻起,他从影迷跃升到一个新境界,希望亲手拍出自己的电影。他对特效尤其感兴趣,他想成为那个使飞船看起来栩栩如生的人。

卡梅隆和朋友迈克·内斯勒弄来了内斯勒父亲的超级8毫米摄像机。他们跑遍尼亚加拉瀑布城,见什么拍什么,把片段剪辑出来制成对家乡的民生实录。他们造出飞船模型,打上光,在一块黑色天鹅绒布前上演宇宙大战,对自己的这番创造颇费思量。卡梅隆说:“当时弄出的这些东西全是垃圾,但却开始促使我们从视觉与叙事的角度思考问题。”他找到一本有关《2001:太空漫游》如何拍成的大部头,学会了一些电影术语,但并未实质性地解开心头的疑问。他只能像对待考古问题那样来探求电影中的精妙特效这一谜团。他回到电影院,将电影重看了多次,尝试着理解库布里克究竟用了什么几近乱真的方法而使得演员仿若置身太空,以及将猿猴送入乱石遍布的史前世界。答案在于,库布里克开创性地运用了前端投影法这种特效技术,即是作为背景的影像投射到演员及其身后那块高反射性的幕布,影像会反射回镜头中,记录在胶片上。库布里克的这种技术,卡梅隆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搞明白,而掌握这种技术,在他后来入行拍摄第一部片子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卡梅隆十六岁时,有一天,菲利普下班回家,带回了一条消息。他所效力的金佰利造纸公司要把他调到加州奥兰治县的工厂去。下一学年是卡梅隆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在安大略省,准备上大学的学生要一直念到十三年级。如果这时候搬家,就不能参加毕业舞会和毕业典礼了,但卡梅隆却毫无牵挂。“吉姆说,‘我们能不能明天就走?’”菲利普回忆,“他知道这样就离好莱坞更近了。”